

二十世纪文化与文论丛书

“现代性”语境中的 邓以蛰美学

XIANDAIXING
YUJING ZHONG DE
DENG YIZHE MEIXUE

王有亮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二十世纪文化与文论丛书

“现代性”语境中的 邓以蛰美学

XIANDAIXING
YUJING ZHONG DE
DENG YIZHE MEIXUE

王有亮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性”语境中的邓以蛰美学/王有亮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7

(20 世纪文化与文论丛书)

ISBN 7-5004-5170-9

I. 现… II. 王… III. 邓以蛰—美学思想—研究 IV. B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81018 号

责任编辑 张永攀

责任校对 韩天炜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盛华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125

插 页 2

字 数 190 千字

定 价 2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节 研究动因	(2)
第二节 前人研究回顾	(9)
第三节 本书立意、研究思路和框架	(13)
第一章 邓以蛰人格性情及美学观的养成	(18)
第一节 传统文化的熏陶和五四新文化的影响	(18)
一 传统文化的熏陶	(18)
二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21)
第二节 徘徊于审美与启蒙、传统与现代之间	(25)
一 审美与启蒙的冲突	(26)
二 传统与现代的张力	(28)
小 结：邓以蛰人格性情的基本元素	(34)
第二章 邓以蛰的艺术史观	
——邓以蛰美学思想体系	(36)
第一节 “体—形—意—理”	(42)
一 艺术之“体”	(46)
二 艺术之“形”	(50)

2 “现代性”语境中的邓以蛰美学

三 艺术之“意”	(54)
四 艺术之“理”	(59)
第二节 “生动—神—意境—气韵”	(65)
一 “生动”	(66)
二 “神”	(71)
三 “意境”	(74)
四 “气韵生动”	(83)
小 结	(83)

第三章 “六法”论

——邓以蛰的艺术方法理论	(86)
第一节 关于“随类赋彩、应物象形、骨法用笔”	(89)
一 随类赋彩	(91)
二 应物象形	(93)
三 骨法用笔	(95)
第二节 关于“传摹移写、经营位置”	(105)
一 传摹移写	(105)
二 经营位置	(109)
小 结	(113)

第四章 书法意境论

——邓以蛰的艺术至境理论（一）	(117)
第一节 书体的演进规律与书法意境美的内部构成	(122)
一 书法意境与书体的演变	(122)
二 书法意境的构成——“形”与“意”	(130)
第二节 书法意境美的创造	(132)
一 书法意境美对笔画的要求	(134)

二 书法意境美对结体的要求·····	(139)
三 书法艺术的意境美对章法的要求·····	(142)
小 结·····	(149)

第五章 “气韵生动”论

—— 邓以蛰的艺术至境理论 (二) ·····	(152)
第一节 “气韵生动”的含义及其哲学基础·····	(153)
一 “气韵生动”的含义·····	(153)
二 “气韵生动”的哲学基础·····	(166)
第二节 “气韵生动”的创造·····	(175)
一 创造“气韵生动”的方法·····	(175)
二 创造“气韵生动”的主观条件·····	(190)
小 结·····	(196)

结 语·····	(198)
----------	-------

参考文献·····	(214)
-----------	-------

致 谢·····	(223)
----------	-------

导 言

本书所要研究的，是一个长期以来被人们遗忘了的名字——邓以蛰。

作为美学家的邓以蛰，在新中国成立前曾经与宗白华齐名，时人有“南宗北邓”^①之称；新中国成立后，邓以蛰、宗白华、朱光潜等三位美学家共事于北京大学，极一时之盛。但由于身体和其他方面的原因，邓以蛰逐渐淡出了美学界，以至于被人们渐渐遗忘。因此，当我们今天再提到邓以蛰这个名字时，不得不说他是“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父亲，人们才恍然大悟。就连美学界内，知道邓以蛰这个名字的人，也寥寥无几，更不用说熟悉他的美学成就了。

邓以蛰之所以值得研究，一是他确实作出了别人无法取代的成绩，二是因为他关涉到中国美学现代性演变历程的复杂性^②。

① 1928年2月，邓以蛰的论文集《艺术家的难关》由北京古城书店出版。该书收集了邓以蛰主要发表于《晨报副刊》上的一系列美学论文，这些文章与宗白华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上的一系列美学论文相映照，代表了“五四”前后，除美学的主要倡导者蔡元培之外，中国学者在美学上取得的主要成就。所谓“南宗北邓”之说，概由此出。

② 中国美学现代性追求的复杂性在于，它不是由一种力量来完成的，而是由来自各种不同方向的合力共同实施的，而且这种追求并未终结，截止到目前为止它仍然是一个尚未完成的系统工程。本书以为，中国美学的现代性追求，至少有三种力

第一节 研究动因

自 19 世纪 40 年代中国文化启动了“现代性”^①工程以来，有两个问题始终摆在中国人文知识分子面前：一是中

量：第一种是以梁启超、蔡元培、鲁迅、瞿秋白、周扬、蔡仪等人代表的功利主义美学；第二种是以王国维、朱光潜等人代表寻找中西融合、侧重于介绍评论西方思想的美学；第三种是以邓以蛰、宗白华和钱钟书等人代表的寻找中西融合、侧重于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思想的美学。第一种力量，由于其与现实政治文化的紧密关系，长期以来备受青睐；第二种力量，因其与西方美学的密切关系而被视作“中国近代以来美学发展的历史趋势”（叶朗语），也受到学界特别的关注；而第三种力量，却因其与中国传统美学有着根本瓜葛而被视为不合时宜，甚至是“反现代性”的东西而横遭冷落。

① 对“现代性”，国内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有论者将“现代性”看作一个确定的现象：“17 世纪现代文化在西方兴起向全球扩张，这种文化的核心结构构成了现代性的内容，西方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文艺学家各有专论，综合起来，无非是两个方面的，一是从历史现象看，一是从内容结构看。其实历史的进展已经包含了内容结构。历史现象上，英国工业革命提供了经济层面的范例，法国和美国的政治革命提供了政治层面的范例，从德国开始的宗教改革和以法国为核心的启蒙运动提供了思想意识层面的基础，以伽利略、哥白尼、牛顿、达尔文为代表的学院性科技提供了理性思维和工具动力。这就已经说清了内容结构：经济（商品/市场）、政治（民主/法治）、思想（启蒙/理性）、工具（科学/技术）。如果我们把这四方面作为一个整体结构，那么，其西方色彩是很浓的。几百年来，西方现代性的全球扩张，一直在证明着这种现代性的普遍性。”[张法：《中华性：中国现代性历程的文化解释》，见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有学者则认为“现代性”是“充满了矛盾和张力”的：“我们可以采取两种思路来分析现代性的矛盾和张力。第一种方法是所谓的历时方法，即把现代性视为一个有前后不同阶段并显出不同特征的历史过程。第二种方法则是共时方法，即在逻辑的层面上来分析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和张力。从前一种历史（历时）的方法出发，我们把现代区分为前期现代性和后期现代性；从逻辑的方法出发，我们把现代性区分为社会的现代化（性）和文化的现代性。无论采用哪一种方法，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两种现代性处于一种对抗的紧张状态。”（周宪：《现代性的张力——现代主义的一种解读》，

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二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关系问题。寻求古今融通、中西融会，是中国思想文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一百多年来，古今、中西交融汇合虽已取得了一定成就，但距离真正的融合尚有很大的距离。中国文化问题尚且如此，中国美学亦复如是。

在 20 世纪中国美学“现代性”诉求的过程中，有四代美学家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第一代以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和鲁迅为代表。第二代以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周扬、蔡仪等人为代表，他们代表了 20 世纪中国美学的第一个高潮期。第三代以李泽厚为代表，同时还有王朝闻、蒋孔阳、高尔泰、周来祥等人。20 世纪 80 年代的“美学热”中又出现了一批青年美学家，至 90 年代崭露头角，他们是“行进中的一代，是‘走出古典’迈向新世纪的一代，他们更为成熟的思想学说或许又将构成 21 世纪中国美学的起点”。^①我们不妨称之为第四代美学家。

20 世纪的中国美学似乎又可分为强调“有用之用”的功利主义美学和强调“无用之用”的审美主义美学两种倾向：前者包括梁启超、蔡元培、鲁迅、瞿秋白、周扬、蔡仪等人；后者包括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和李泽厚等人。因学养和兴趣的不同，这些美学家或偏重于文学，或偏重于书画，所以 20 世纪的中国美学似乎还可分为文学美学和艺术美学，王国维、梁启超和朱光潜属于文学美学的代表，邓以蛰、宗白华和王朝闻属于艺术美学的翘楚。一个时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相比之下，功利主义美学、文学美学更受到重视，而审美主义美学、艺术美学

载《文学评论》1999 年第 1 期）我们以为，作为一个复杂而又系统的工程，“现代性”之作为一个整体看，是个具有一定确定性的历史过程；而就其内部来看，它无疑“充满了矛盾和张力”。

① 陈文忠：《美学领域中的中国学人》，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2 页。

却受到有意无意的忽视。

回顾中国近现代主流美学的历史，我们觉得它有两大特征：一是始终受制于西方美学理论，而疏于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研究；二是始终受制于中国社会政治，而疏于对审美自身特点的研究。邓以蛰的美学研究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展开的。在邓以蛰的美学研究中，他有意识地对其所处时代主流美学之褊狭进行某种程度的矫正和补充，这正显示出邓以蛰美学思想的价值和意义。

实事求是地讲，就第二代美学家中，邓以蛰的美学成就确实难于同朱光潜、宗白华等先生媲美；^①但是，邓以蛰先生也确实做出了别人不可替代、不可小觑的贡献。邓以蛰的书画美学思想，是20世纪中国美学“现代性”追求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理应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的美学研究，都起步于20世纪20年代，成熟于30年代。他们年岁接近，资历也差不多，而且都学贯中西。他们从各自的研究角度，丰富了中国近现代美学思想。朱光潜侧重于介绍评论西方美学，进行美学基本理论建设和文学批评，而宗白华、邓以蛰则致力于中国传统艺术的研究与批评。宗白华比较全面一些，书、画、诗、音乐、建筑、舞蹈、戏剧等都有专门的研究与发挥。邓以蛰突出在书画美学方面，在诗歌和戏剧理论方面也有独到建树。三人都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接受西方美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的熏陶，对

① 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邓以蛰美学论文的数量远远不及朱、宗二人。其次，邓以蛰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身体方面的原因，没有参加五、六十年代的美学讨论，基本上没有什么著述，而且去世也较早，没有赶上80年代的“美学热”，朱、宗二人却恰逢其时。再次，朱、宗二人除了著书立说之外，还翻译了不少西方美学著作，而邓则未做这方面的工作。所以，新中国成立后的邓以蛰，就逐渐从美学界淡出了。

外来的东西真正进行了消化，并能结合艺术审美实践进行具体发挥，建树自己的独到之见，不留生搬硬套的痕迹。^①应该说，对他们进行全面认真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认清：中国现代美学到底有哪些创获？有哪些失误？创获与失误的深层原因何在？可以总结出哪些经验教训？如何调整我们的文化心态以应对 21 世纪的严峻挑战？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反思我们走过的历程，克服我们自身文化的弊病，来建构 21 世纪的中国美学？但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对朱光潜和宗白华的系统研究已经有不少成果，比如阎国忠、王攸欣等人的朱光潜研究，林同华、王德胜、汪裕雄、桑农等人的宗白华研究；^②但是，多年来，邓以蛰所代表的中国美学研究中的新古典主义^③思潮，在中国美学发展

① 参见聂振斌《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98—199 页。

② 研究朱光潜的专著就有阎国忠的《朱光潜美学思想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朱光潜美学思想及其理论体系》（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版）、商金林的《朱光潜与中国现代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钱念孙的《朱光潜与中西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劳承万的《朱光潜美学论纲》（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王攸欣的《选择·接受与疏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朱光潜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年 8 月版）；研究宗白华的专著有林同华的《宗白华美学思想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王德胜的《宗白华评传》（商务印书馆 2001 年 12 月版）、汪裕雄、桑农的《艺境无涯——宗白华美学思想臆解》（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2 月第 1 版）等。至于研究朱、宗二人的论文就更是不计其数了：据不完全统计，从 1994 至 2003 年的十年间，研究朱光潜美学的学术论文达 224 篇，研究宗白华美学的达 139 篇。

③ 这本来是西方美学和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与古典主义密切相关。所谓古典主义，是指 17 世纪和 18 世纪前半期流行于欧洲君主专制时期的一种文艺思潮或文艺流派。它的代表人物在创作实践和文艺理论上，把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文艺视为必须仿效的崇高典范，从中吸取题材、情节、形象和创作经验，并赋予它们新的历史内容。古典主义一词由此而得名。从哲学上考察，古典主义是与唯理主义相适应的，它是在当时流行于整个西欧的唯理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而新古典主义，则是 18 世纪 50 年代至 19 世纪初风靡西欧的美术样式，它力求恢复古典美术

史研究中缺席^①，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现代美学界的一项重大的疏漏。本书想就此作些论析，以期深化这一课题的研究。

邓以蛰，字叔存，安徽怀宁县人，1892年1月9日出生，1973年5月2日去世。他是清代大书法家和篆刻家邓石如^②的五世孙。邓以蛰的青少年时期，正值清末“西学”兴起、“维新”之风大盛的时代，大批青年人为了振兴中华，东渡日本留学。1907年，邓以蛰到日本学习，1911年以文学学士毕业于日本早

（主要指希腊艺术和罗马艺术）的传统，强烈追求古典式的沉静凝重和考古式的精确，受理性主义美学的支持，大量采用古代题材。与衰落的巴洛克美术、罗可可相对，它代表着一股借复古以开今的潮流，并标志着一种新的美学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与启蒙运动和理性时代相适应的美术样式。新古典主义被19世纪的学院派视为典范，长期成为正统。但同时又由于它对远古和异国的热烈憧憬和官能性的倾向，也构成了浪漫主义美术的先驱。

笔者将邓以蛰的美学研究定位于新古典主义思潮的一部分，是受俞兆平先生《新人文主义与中国现代格律诗派的缘起》（《文史哲》2003年第3期）一文的启发，期冀以此标明邓以蛰在中国美学现代性历程中的特殊地位和文化态度。

① 研究邓以蛰美学的专著至今未有；1994年之前的研究论文仅有刘纲纪的《中国现代美学家和美学史家邓以蛰的生平及其贡献》（《美术史论》1982年第6期），以往对邓以蛰先生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真正全面、系统的研究尚待来者。

② 邓石如（1743—1805），原名琰，字石如，又名顽伯，号完白山人、完白、古浣子、游笈道人、风水渔长、龙山樵长等，安徽怀宁人。有人把他归为皖派，更多的人因为推崇他在篆刻史上杰出的贡献，而尊其为“邓派”。邓石如幼年时家境贫寒，一生社会地位低下，他自己说：“我少时未尝读书，艰危困苦，无所不尝，年十三四，心窃窃喜书，年二十，祖父携至寿州，便已能训蒙。今垂老矣，江湖游食，人不以识字人相待。”邓石如首创在篆刻中采用小篆和碑额的文字，拓宽了篆刻取资范围，在篆刻上形成了自己刚劲婀娜的风格，巍然崛起于当时的印坛，可说与皖、浙两派形成鼎足之势。邓石如的雄风一直影响到同时期的包世臣、吴让之、赵之谦、吴容、胡澍、徐三庚等人。在篆刻艺术发展史上，邓石如是一位杰出的大家。存世有《完白山人篆刻偶成》、《完白山人印谱》、《邓石如印存》等。邓石如“疏能走马，密不透风”和“计白当黑”的理论，对中国古代艺术理论和美学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至今仍为书画艺术和美学界所重视。

稻田大学后，回国做了教师。在日本期间，邓以蛰第一次接触了西方文化。从日本回国以后，邓以蛰从事启蒙工作和文化教育事业，先后当过日文教员、安徽图书馆馆长。

1917年，邓以蛰渡洋赴美，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和研究哲学，较侧重于美学研究。从大学到研究院，共学习了五年之久。这种经历促使他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拥护者和新艺术思想的传播者。1923年，邓以蛰从美国归来，被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时年31岁。

1933—1934年，邓以蛰出游西班牙、英、法、德、意诸国，遍访意大利等国的艺术博物馆，在法国巴黎大学游历半年之久。这是他第三次广泛接触西方文化。邓以蛰从西班牙等国游学归来之后，遂集中精力于学术研究，不再像过去那样直接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建设工作了，而是专心研究中国古代书画和美学理论。

新中国成立以后，邓以蛰先在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后，又来到北京大学哲学系，时与朱光潜同事，但不久由于年老多病退休。

邓以蛰的美学思想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成熟于30年代，明显地表现出两个发展阶段：前期主要是提倡新文艺，表现出一种积极的批判精神和入世姿态；30年代和40年代，主要研究中国传统的书画艺术，不再直接参与现实的文艺运动。^① 邓以蛰美学思想的形成，明显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美学思想以及西方美学特别是黑格尔和克罗齐美学的影响。

我们想指出的是：

① 这种现象在邓以蛰同时代的学人中极为普遍，我们不妨称之为“邓以蛰现象”。对这种文化现象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对我们理解中国美学的现代性具有重要意义，因而也是我们这一代学人的历史使命。

第一，邓以蛰的美学思想是中国现代美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其研究可产生“补缺”或者说填补“空白”的意义。

第二，邓以蛰的美学思想构成了中国现代美学的一种特殊的旋律，表面看似乎是一种不和谐的旋律，但的确是中国美学现代性追求中不可忽视的另一侧面。

第三，邓以蛰不是孤立的，而是代表着中国现代美学史一种特殊类型的美学家。如果说，朱光潜主要借重于西方，宗白华介于中西方之间，那么邓以蛰则主要倾心于国学传统，其独特之处很值得我们研究。

在中国传统美学向现代美学的转换过程中，邓以蛰以毕生的心血致力于中国传统的书画研究，孜孜以求地运用西方哲学美学理论观照中国书画艺术的发展，清理丰富的中国书画美学思想遗产，并作出了现代阐释。他不仅雄辩地说明了中国书画是一种纯粹的、至高的艺术，而且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书画艺术的美学本质，廓清了中国书画没有美学理论的糊涂认识。

学界似乎有将邓以蛰美学视为近乎国粹的区域性学术现象，而不是自觉呼应世界潮流，并经中西融会向现代人文转型的精神再创。^①事实上，邓以蛰的美学思想不是“土生子”，而是“混血儿”，是中国美学现代性诉求中又一种不可忽视的理论形态——中国美学现代性追求中新古典主义思潮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且，邓以蛰所代表的新古典主义思潮美学研究，是具有世界背景和语境的。可惜，以往的研究者都未能在这样的理论视域中去探讨和分析。

^① 学界长期以来没有充分注意到邓以蛰美学贡献的一个重要原因大概正在于此；即使目前不多的研究者（如刘纲纪、聂振斌、邓牛顿等人）也没有将邓以蛰放在中国美学现代性视域中去研究。这不能不说是邓以蛰研究的一大缺憾。

对于邓以蛰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的地位，宗白华在其为《邓以蛰美术文集》写的序言中有着非常中肯的评价：“邓先生对中国艺术传统有深入研究，青年时代又曾到美国研习，还游历过欧洲不少国家。他写的文章，把西洋的科学精神和中国的艺术传统结合起来，分析问题很细致。因为他精于中国书画的鉴赏，所以他的那些论到中国书法、绘画的文章，深得中国艺术的真谛，曾使我受到不少教益。”^① 这一评价不仅非常到位，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性”的复杂性。

第二节 前人研究回顾

如上所述，邓以蛰的美学思想，起步于20世纪20年代，成熟和完成于三四十年代。但是，一直到1982年，学术界才有刘纲纪开始研究其美学思想；邓以蛰去世于1973年，然而直到1998年，一部并不完整的《邓以蛰全集》才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即使从1998年以来也仅仅有两篇介绍性文章和两篇研究性的论文发表。

多年来，介绍和研究朱光潜和宗白华的文章不计其数，大部分有关“中国近现代美学史”的著作更是“言必称朱、宗”，而对邓以蛰却甚少提及。

最早介绍和研究邓以蛰美学思想的学者，要算邓以蛰的弟子刘纲纪。他于1982年在《美术史论》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现代美学家和美术史家邓以蛰的生平及其贡献》的长文，引起了后来者对邓以蛰的研究兴趣，也确定了对邓以蛰研究的基调。之后，

① 刘纲纪编：《邓以蛰美术文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版。

一些中国近现代美学史著作才开始注意到邓以蛰的美学思想。在笔者所涉猎的“中国近现代美学思想史”著作中，提到邓以蛰名字的总共有三部：邓牛顿的《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史》、聂振斌的《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和张涵、史鸿文合著的《中华美学史》。

邓牛顿的《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史》出版于198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其中介绍邓以蛰美学思想的文字虽只有2000字左右，却有开创之功。这距离邓以蛰去世已经有15年了。如果邓地下有知，也不会再过于寂寞了。该书称邓为“现代著名美学家”，将他与宗白华并提，并简略介绍了邓的书法美学思想。

聂振斌的《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出版于1991年，第十一章“艺术美学研究——邓以蛰”较全面地介绍了邓以蛰的美学思想。作者将邓以蛰放在中国古典美学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语境下来分析，尤其是把其放在“艺术美学研究”的背景下去认识，并把他与朱光潜、宗白华并提，这显示出学术界对邓以蛰美学思想的新认识。尤有进者，聂振斌不仅肯定了邓以蛰作为美学家在中国近现代美学史上的地位，还称邓以蛰为“著名的美术史家”，这就显出了邓以蛰在中国近现代美学史上独特的地位。该书不仅对邓以蛰做了更为准确的定位，在对邓以蛰美学思想的阐发上，较邓牛顿更全面和详尽。

张涵、史鸿文合著的《中华美学史》出版于1995年（西苑出版社出版）。其中“近现代艺术美学举要”一节，认为“近现代艺术美学，是整个近现代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邓以蛰及其艺术美学研究”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语境下展开的。该书称邓以蛰为“著名美学理论家和艺术史家”，认为“其美学思想主要在艺术批评和艺术史研究方面，特别是对中国传统书画美学有着精深的研究”。该书还介绍了邓以蛰的《艺术家的难关》、《书法之欣赏》和《画理探微》等三篇论文的基本内容。与聂振斌的《中国

近代美学思想史》相比，该书在对邓以蛰美学思想的归纳和总结方面没有多大推进，基本沿用了聂振斌的框架和思想。

在上述研究邓以蛰的著述中，刘纲纪的论文和聂振斌的《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著作，应该算是比较详尽和全面介绍邓以蛰美学思想的著述了，也代表了目前邓以蛰美学思想研究的最高水平。

应该指出，邓以蛰美学思想研究尽管取得了不小成绩，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第一，一味地平铺直叙，缺乏对邓以蛰美学思想核心概念和理论系统的全面把握。我们以为，对邓以蛰美学思想的研究，还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目前还只是停留在 10 年前，甚至 20 年前的水平。

对于邓以蛰的突出贡献，刘纲纪指出：邓以蛰“把画史与画学、书史与书学紧密地结合起来，对中国书画理论作一种哲理的研究，提出了一种关于中国书画的具有相当完整的系统性的美学理论。这在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上，应当说是一个独立的贡献，也是第一次尝试。应用西方美学来研究中国传统艺术，始于王国维。但王国维的研究，主要是在文学方面，对于书画，几乎没有涉及。‘五四’以后，有关中国书画美学的研究，绝大部分是介绍或转述日本人的著作，特别是金原省吾的著作。中国人自己的，有独立见解，并且具有理论系统性的研究，据我目前有限的见闻，大约是由邓以蛰开始的”。^①但是，关于邓以蛰美学思想的核心和理论系统到底是什么，刘纲纪亦语焉不详。

第二，对邓以蛰美学思想研究中的方法论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邓以蛰的美学思想形态比较特殊，它不是所谓系统的、成体

① 刘纲纪：《美学与哲学》，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54 页。引文中的着重号为引者所加。